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刘志鹏

提 要：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关键词：抗战时期 广东 国民党 沦陷区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随战事发展和国民党中央的规定，不断出现更迭变化，但始终存在于粤北地区，筹划全省党务组织运作，不仅维持着战时的存在，而且开展了抗战宣传、战地动员等抗敌工作，然而由于党政分歧、派系纷争等，党权始终处于较低的位置，难以形成领导抗战的重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华北地方党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笔者撰写的《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探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拒敌·内斗·生存：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考察》（《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3期）、《潜伏与虚弱：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福建论坛》2016年第2期）、《华北沦陷区国民党民运工作研究——以冀鲁为中心的考察》（《求索》2012年第6期）等对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省均有深入研究。然而，关于抗战时期华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省国民党党务的研究，仅存在于相关综合著述中，尚未有专门的探究。^① 本文主要依据鲜少使用的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的有关国民党党务档案，加之以《广东党务》《李汉魂将军日记》《余森文回忆录》等相关文献资料佐证，以李汉魂为中心对战时国民党广东省党务组织运作进行考察，以期从政党这一视角考察战时华南地区国民党的党务机构、内部运作及其抗战活动和成效。

一 李汉魂兼掌“不稳定”的粤省党部

全面抗战8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先后实行特派员制和主任委员制，省党部负责人先后有6人次轮流担任，分别为余俊贤、钟天心、吴铁城、李汉魂、方觉慧、余俊贤，其中任职时间最长者则为李汉魂，从1939年3月到1944年3月，5年多的时间，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及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20RWD002）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省党务状况的研究并不多见，近年来主要有梁馨蕾的《抗战时期粤省政局的权力博弈与政治生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一文从党、政、军三方权力博弈的角度对粤省党务进行了论述，其他则为沙东迅的《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广东史志》2001年第2期）、陈榕亮的《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等有关粤省党务的资料性文章。

员。广东省党部作为全省党务组织系统的指挥中心，其所在地因战事发展多经变迁。1938年11月，随着广州的沦陷，国民党省党部先由广州迁入云浮，后迁连县、曲江，又迁龙川、平远，直至抗战胜利始迁回广州。其实，不仅抗战时期由于粤省党部负责人的变化和办公地点的迁移导致粤省党部的“不稳定”，即使是在整个抗战时期，以担任主委时间最长的李汉魂而言，其任期内国民党粤省党部组织系统也相当不稳定。

李汉魂属于全面抗战前倒向国民党中央的非嫡系，能独自掌控粤省党政，可谓是在“吴铁失城、余汉无谋”下广州沦陷之后的临危受命。1939年3月14日，李汉魂在日记中写道：“粤省党部久未改组，鹿逐者众，各方颇多传疑。前天已发表予任主任委员，余森文任书记长，此后党政固能调协。然责任加重，亦正多一麻烦也。予对于以往的党务，固深致不满，然一旦到了自己的肩膀上，欲求整理，正未易言，而干部难得，尤属可虑。”^①此时的李汉魂不仅在政治方面基础薄弱，还兼掌了一个“不稳定”的省党部，且国民党内各方势力对于党部的人事安排则纷纷插手。

早在李汉魂主政广东之前，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就任命亲信余森文为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广州沦陷之后余森文则一直以书记长身份兼负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责。据余森文回忆，他是在广州沦陷后从祁阳到韶关，“寻找广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主任委员吴铁城。韶关已被日机轰炸，满目荒凉，一片瓦砾，惨不忍睹”，余森文“一直找到从化三华镇，广东省政府及各厅已作鸟兽散。省党部一个主事人也没有。党籍册都已丢掉，只有三四个职员，一个管大印，一个管账目”。1939年1月，“广东国民党党部办事机构由从化迁到韶关（曲江），广东省政府则一直在离韶关约20里的山区翁源镇”。到连县不久，李汉魂接替吴铁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而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由余森文兼至李汉魂上任。余森文“选择一所因战事停办的中学，修理后重新搭起省党部的架子。原有省党部的整套人马，因战祸离散，人手严重不足，所以登报请原广东省党部公务人员在15天内报到，否则作自动离职论。限期内报到的有组织科长林乾祐和黄龙舆等，但人手还是紧缺”。余森文趁机“招兵买马”，“通过旧日关系延揽人才。凡是抗日的实干分子都予以延用”，但“用的很多人都不是国民党员”^②。这就是李汉魂作为主委接手的“不稳定”的省党部。

李汉魂接手粤省党部后第一件事就是改组省党部，进行人事安排上的重新部署，被反对者认为是“排除异己”，“凡属中央所派之委员或督导员而非由其介绍者，均遭排除歧视，或以自请辞职协请中央，或强调地域关系请求改派，或挑拨离间有意造成纠纷摩擦，如余森文、曾集熙等固因此排除以去，即邹洪、丘誉、胡文灿、缪培基、罗鸿诏、陈协中等，亦先后遭其排斥”。直到1943年，省党部委员中“除郑丰、陆冠莹外均被歧视，有如赘疣，即其私人袁晴晖，亦以偶有违反意旨、稍存忠厚，辄遭重谴，自是以下则更迁调降黜、为所欲为，故在职工作同志其能保有二年以上历史者极为稀少，所有旧人殆已排除净尽矣”^③。

鉴于朱家骅与余森文之间的旧属关系，余森文成为首当其冲被改组的对象，李汉魂“联络行营副主任白崇禧等，联名电呈蒋介石，要求将余森文调离广东，以便使李汉魂行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责”，然而，“蒋介石看了电文之后，反以为余某人是个书记长，敢于同李、白顶，是非常好的。蒋介石对朱家骅说，由省主席兼主委是挂名的，我就是要书记长当权”，在训练班结

①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5年，第1册，第246页。

② 参见朱馥生：《余森文回忆录》，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20辑，1998年，第94页。

③ 参见《冼家锐、李伟光、萧宜芬、谢鹤年、李伯鸣、许成业等密报》1943年7月6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束时，蒋介石还要求朱家骅通知张发奎，“凡是第一期党政训练班的，一律不准动”。作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亦曾在会议上公开称赞，“余书记长在废墟上建起了广东省党部，经常看到他不坐小车，在外面跑。你们这些老爷为什么不可以不坐小轿车？他人还没走，你们就大摇大摆地开动全部小汽车了”。李汉魂作为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公开向余森文发难。他一方面借国民党中央派邓青杨、黄玉明、伍知梅等人到广东省党部调查之际，翻出“余森文用了多少共产党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利用余森文远赴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之际，将余森文主办的《北江日报》停刊，“报社改成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印刷厂”^①。

尽管有蒋介石的金口玉言作为免死金牌，但李汉魂借着省主席的政治权威，“接任之初，即排斥余森文同志为省党部书记长，甚且以辞去省主席相要挟，继更排挤曾集熙同志，考其用意无非欲包揽一切以便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巩固个人政治地位，遂至粤省党务，唯有人事上之布置安排，而无工作上之督导考核”^②。最后还是余森文离开，粤省党部再次陷入“不稳定”状态。

正当粤省党部面临再次改组之际，在省党部人事安排上，CC系的陈果夫也曾致函朱家骅，“粤省党部有改组讯，兼职委员一律撤销，高信同志虽兼职，但对党忠实，望注意”^③。而朱家骅却设法推辞，“粤省党部改组一节，系李主任委员之要求，白、张二兄亦曾电总裁建议，经再三考虑结果已决定不予改组，李兄现亦明了，可无问题”^④。此后，刚刚接任省党部主委的李汉魂则以退为进，请求辞职。^⑤

然而，其后的粤省党部亦“不稳定”，内部矛盾重重。先是党部委员缪培基，因与李汉魂难以相处，不仅电请辞职，而且累述李氏种种不足。1939年10月，身在桂林的缪培基指出“广东省党部因李汉魂主委成见过深，对委员人事坚持不让，以致半载光阴荏苒而逝，省党部本身既未健全，各县市党部尤鲜办法，民众运动尚在窒息之中”，同时批评李汉魂的“高州主义及排斥奋发前进之青年同志”。最终，缪培基“弃党从文”，“取道贵阳，前赴云南澂江中山大学教课，在文化学术上努力”^⑥。恰在此时，朱家骅也以曾在中山大学任职而网罗中大师生进入党务系统，在广东一隅形成朱家骅系。李汉魂时期的粤省党部委员中，许成业、萧宜芬、李伟光3人均毕业于中山大学，与朱家骅以师生相称，成为李汉魂掌控省党部的最大对手。1942年11月5日，冼家锐、李伟光、萧宜芬、谢鹤年、李伯鸣、余建中、许成业等以《密报》形式呈报朱家骅广东省党务情形，指出“粤省为革命策源地，故本省党务倘提挈有方，竭诚领导，信能蓬勃进展，以为倡导。诟李汉魂主任委员胸襟狭隘，私暱者则平地登天，异己者则刻意排斥”^⑦。

① 参见朱馥生：《余森文回忆录》，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20辑，第97—98页。

② 《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陈果夫致朱家骅函》1939年6月1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④ 《朱家骅复陈果夫函》1939年6月，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参见《李汉魂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23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 参见《缪培基致朱家骅函》1939年10月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⑦ 《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李汉魂兼任粤省党部主任委员期间，曾有余森文、陆宗骐、郑丰、袁晴晖四任省党部书记长，均“不稳定”。先是余森文出走浙江，后省党部书记长“初为陆宗骐（信宜人），陆后来做了参议员，由郑丰接替；郑后来做了广东建设厅厅长，由袁晴晖接替。袁晴晖（东莞县人）与李汉魂没有交往关系，只因其胞弟袁春晖于李汉魂任师长时，历任师政治部科长，晴晖因得夤缘，在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教育长，数月之后，便调任省党部书记长”^①。1941年12月，原为李汉魂重用的郑丰联合陈协中、李伯鸣请求朱家骅“为增强机构配合军事起见，拟恳派萧宜芬同志为该部主任委员”^②。1943年秋季间，袁晴晖“在省党部郁郁不得志”，“联络委员李伟光、李伯鸣、余建中等，以李汉魂过于专断，致工作无由表现为辞，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辞职”。当时广东省党部除主任委员、书记长外，主要机构“有秘书、组训、宣传、监察四个处，秘书处由袁晴晖兼任，下设总务、人事两科；组训处长由陆冠莹兼任，因赴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由李伟光代理，下设组织、训练、党团指导三科；监察处长由余建中兼任，下设第一、第二两科”。而袁晴晖等“四个人的辞职，等于四个处的解体，即等于拆李汉魂党部的台，而且事前不向李说及，等到部令慰留，李汉魂方知其事，使他非常痛心”。李汉魂“曾对袁晴晖发脾气，说他带兵数十年，未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次的事，即是4人联同反对他。因此他更觉得办党务十分棘手，不久，便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但事经好几个月，中央不复电批准，也不慰留，直至1944年2月，才派出方觉慧接主粤党务”^③。

从李汉魂兼掌粤省党务来看，为了配合军政国民党中央在地方党务的人事安排“身不由己”，同时粤省党务自身基础薄弱，再加内部派系纷争，党权难以顺利在战时广东地区加以实施。

二 李汉魂与粤省党务工作开展

既然李汉魂身兼粤省党部主委，那么其党务工作开展情形如何呢？

1939年4月粤省党部改组之后，据赴广东视察党政的陆幼刚指出，尽管“一切进行，颇形积极”，然而“党与党员之间，党和与民众之间，未能发生紧密联系，故步骤或未能一致，成效未能十分显著耳”^④。陆幼刚特别列出下列情形：“1. 工作人员不敷分配。2. 档案遗失党籍紊乱。3. 各县市党务间有停顿，书记长不知去向者。4. 沦陷区及战区工作多未实施。5. 分区督导制停顿。6. 省市民众团体多散处各处。7. 宣传品及青年读物太缺乏。8. 地方骈枝团体太多，人力财力不经济。”^⑤摆在李汉魂这一省党部主任委员面前的党务困境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由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设计的初衷，便是希望党政工作步调一致。此时，省府主席若不热衷党务，乐得兼一虚衔，由中央组织部所派书记长掌握实权，省一级党政关系勉强尚能维持”^⑥。李汉魂主持广东省党部时，却并没有把省党部主任委员

①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6页。

② 《郑丰、陈协中、李伯鸣致朱家骅函》1941年12月18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参见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7页。

④ 陆幼刚：《广东省党务视察总报告》1939年8月16日，特种档案6/35.24，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⑤ 陆幼刚：《广东省党务视察总报告》1939年8月16日，特种档案6/35.24，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⑥ 梁馨蕾：《抗战时期粤省政局的权力博弈与政治生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06页。

看作是“虚衔”，其对于权力仅次于主任委员的书记长职位牢牢抓住，意图掌控整个粤省党务工作。如李汉魂初掌粤省党部，就将朱家骅所派之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排挤出省党部，但是由于历史渊源较浅，李汉魂“对袁晴晖不大信任”^①。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和省党部相距较远，“当时广东省政府设在韶关十数里外的黄冈，而省党部则设在韶关的黄田坝，相去约廿里，李汉魂每周只到省党部会议一次，其余时间不到”。即便如此，“他的判行公文小章，也不交给袁晴晖保管使用；一般公文，本来由书记长代判行，但各科室处拟稿，送由秘书签具意见后，送经书记长判行，又要再送回秘书加盖李汉魂小章，才算完成判行手续。因为秘书周天任，是跟李汉魂工作多年的，而重要公文，还要送去省政府经李汉魂阅过，或者候他到部判行”^②。可见李汉魂对于粤省党权把握较严。

李汉魂治理粤省党务与其他党政一元化的省份颇有不同，李汉魂并没有放手让省党部书记长管理党务工作，而是事无巨细地全面把持粤省党务，这不仅与其没有得力亲信有关，更与其对于党权认识的不断发展有关。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10月，李宗黄视察粤省期间与其约谈党务，使其对“应致力以党为重心”一层颇多感悟。李汉魂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下多条心得：“1. 政治地位有时失败，而党则无失败，故应注意以党为重心。2. 余目前最重要之干部有三：省党部书记长；省政府秘书长；干训所教育长，而教育厅长应居四位矣。3. 注意由统一信仰而统一思想与行动，凡有不同之意见，须据实报告，一经决定，则不得再有异议。如仍不能解决，可付诸小组讨论，作最后决定，不许有私见，只可有公见。4. 须为干部找出路，不许干部各自找出路及包揽外事。5. 行的道理本于心理建设，而心理建设又本于三民主义。四要、五约、六则须归纳于上述原则之中，此为精神改造的法则。6. 用人须法制化——法规、审定、考核。7. 用人公开——非贤不用，非才不用，非考核不用，先由内政公开——日结、年结，一切支出均依照法令有后言。”^③ 李汉魂把以上几点作为“统一思想与行动至要旨，再加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则大本以立，有本有源，事业之成，直自然的结果耳。又研究宣传训练，俱宜以党为体，以政为用，而融洽于一炉”。李汉魂自己也承认，李宗黄“此来所以益余者甚多，当作为此后改善之标的也”^④。由以上观察，李汉魂对于党权及党务的重视程度能够窥见一二。

国民党在广东有着很好的革命基础，据视察广东党务的陆幼刚报告，“广东为革命策源地，党务向称发展，本党力量久已深入民间，而民众对党咸多认识及信仰，即偶有异党煽惑，亦不能动摇整个力量”^⑤。尽管李汉魂是作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但在其主管省党务工作期间，整个粤省党务在组织、训练、宣传、民运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起色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广州各地的沦陷，广东省党部“为加强各县市党务工作，将大部工作人员组织战时工作督导团，全省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督导区，每区指派委员1人为团长，率领职员出发各县，切实就地督导，发挥党员及民众抗敌精神”。广东省党部“自连县迁设曲江后，逐渐转入正常状态，并进行健全基层组织，征求新党员，强制公务员入党等，之后又指导民众团体恢复活动，建立各级宣传机构，控制舆论，加强党员训练，创设社会报务处，倡设党员招待所，普设文化服务处，举办党员生产事业机构，促进党政联系，举办征募慰劳事业等方

① 参见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6页。

② 参见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7页。

③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第380页。

④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第380页。

⑤ 陆幼刚：《广东省党务视察总报告》1939年8月16日，特种档案6/35.24，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面，均按步进行”^①。

1940年5月李汉魂负责党务一年后，称由“过去的党务经费，是很困难支绌的，有的县份，月仅支32元”，变为“自5月份起各县市的经费，都有增加。现在最少的有170元，每月全省各县市增加了13100元”。同时，他指出战时党务工作“仍然是感觉困难的。各县市工作同志，在此经费困难当中，能够展开工作，能提起精神克服困难，这是很难得的”。李汉魂还提到“鹤山书记长黄汉山策励民众，接济军粮；中山书记长林聿夫协助抗战，致被炸伤；饶平书记长詹竞烈，合各县府活捉伪官林如渊；从化书记长欧阳钟，灵山书记长劳权等在前线都很努力，其余各县市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表现英勇奋斗的也很不少，这是很值得快慰的”^②。由李汉魂亲自编制的1943年广东省党部工作经费预算达到4181380元，“内含本会员工子弟学校经费、党务督导处电台经费、本会员工体育会经费、广东省党团球场经费、征求优秀党员经费、全省党务会议经费等八项”^③。这些经费的追加在战时并非多么雄厚，却也成为党务工作开展的物质基础。

然而，问题亦不少，如“梅县市党部书记长赴韶受训，职员怠忽工作；广州湾直属党部书记黄锦赴韶受训后，不负责职员，且前书记党籍资料并未移交，上级来文均未开启，以致一切无从着手”^④。邓青阳调查广东省各县党务时，就专门提出应行改革之处，“该省各县书记长常兼地方其他职务，弊端丛生，有失党部尊严与信仰，应予申诫禁止。各县党务计划委员会原以集思广益，应经常开会研讨各项重要问题，编造记录，按月报呈上级党部一次，每三个月必须提出该县党部计划方案，此等工作必须视为重要成绩”^⑤。

从抗战时期粤省地方党务来看，各县市党部以下基层组织自广州沦陷之后停顿很长时间，经过李汉魂时期一年的整饬，已经“成立区党部335个，区分部2509个，小组4180个。新征党员21093人”^⑥。同时，李汉魂在北江、惠梅两区检讨会上亦指出，“各级组织未臻健全”，“本省会党部以下各级组织，固有许多县市已妥为整编，但仍有少数县市未能遵照办理，例如区分部及小组，尚未划编成立完竣者有南雄、曲江、花县、揭阳、潮安等县，而小组未能划编成立者更多。即已编竣之区分部及小组，亦间有不能按期开会者”^⑦。然而，整个抗战时期，广东省“征求新党员人数逐年递增，超过24万，冠于全国。党部组织之发展亦与日俱增”^⑧。这些成绩与李汉魂主持粤省党务有莫大的关系，当然由于广东省“沦陷地区广大，党部基层组织，由于督导不周而流于形式，有不少名存而实无多少活动”^⑨。

仅仅凭借静态的党务组织和党员个体，不可能形成实际动态的党务效能，必须对党员进行训练，培养其党务能力。从抗战时期粤省党员的训练来看，“党员训练，除按年分期举办党务干训

① 沙东迅：《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粤海抗战史谭：沙东迅广东抗战史学论文选集》，第159页。

②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2页。

③ 《广东省执委会32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概算》1942年，特种档案2/59.3，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④ 《中秘处致广东省党部电》1939年8月8日，特种档案6/38.15，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⑤ 参见《中秘处致广东省党部训令》1939年9月14日，特种档案6/38.17，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⑥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2页。

⑦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2页。

⑧ 沙东迅：《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粤海抗战史谭：沙东迅广东抗战史学论文选集》，第159页。

⑨ 沙东迅：《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粤海抗战史谭：沙东迅广东抗战史学论文选集》，第159页。

班外,一般训练,则以倡导普设党员招待所为中心”。广东省为我国革命的策源地,党员文化水平较高,“据1944年至1945年9月统计,党员中受高等教育者占5.4%,受中等教育者占46.1%,受初等教育者占28.6%,其他占19.9%。妇女占5%”。为了尽快地使基层党务干部适应抗战时期党务工作,起始“由第4战区党政军干训团调训粤北各县党务工作人员。后广东干训团成立,实施统一训练,省党部在该团附设党务班,从1941年5月至1946年上半年度止,共举办7期,共387人。对县市以下的基层干部也采取各种灵活方式实施训练”。同时,广东省党部“在扩充中山室、普设党员招待所、党员训练、提高党小组活力、实施党员通讯训练、发挥政治情报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①。

广东虽说是中国革命策源地,但基层乡村“民智是非常落后的”。据余汉谋回忆在抗战初期驻守翁源时,曾到前线巡视,整好碰上日本一架侦察机在上空盘旋,这时余汉谋正坐船过渡,便问船夫:“这是哪里来的飞机?”船夫答道:“这是南京老蒋派来打广东的呀!”余汉谋称,“这时已经抗战一两年,老百姓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和日本开战,还以为我们在打内战,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便“令广东教育厅、省党部,在政治教育上多多努力”,他自己“又以一个团的经费,编训了七八百名的尉级军官,施行训练以后,派到农村去宣传和组训工作,使老百姓认识抗战,对政府发生信心”^②。李汉魂也提到,“宣传工作未能深入,民众基础之未能完全确立”^③。所以,当抗战进入第二阶段时,李汉魂认识到宣传工作尤为重要,正如蒋介石所说“宣传重于作战”。他提出:“今后的宣传工作,要特别注意。要多多运用宣传的组织和工具,如宣传委员会、宣传工作队、传单、壁报、戏剧、歌曲、音乐、集会、演讲等使宣传工作,由城市深入到乡村,尤其要深入游击区,因为被敌人暴力占领的区域民众渴望我军收复,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些抗战的消息,他们不惜以高价买张纸看,而且很多人围着看,游击区的民众得不到我们抗战的消息,这是我们负宣传责任的同志,应当负责的。”^④李汉魂认为宣传工作的最低限度,是要使民众“知道为什么要抗战,怎样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然后才能使他拥护抗战,协助抗战,参加抗战,宣传工作,一定要做这种地步,才能收到实效”^⑤。

李汉魂时期的广东省党部,在宣传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一定努力,“宣传的工作是在整齐的步调下锐进着了”。一方面完善县市基层宣传机构。经过党务整顿,“宣传的阵容更加严整了,鲜明了。为要齐一宣传的步调,加强宣传的效能,把繁杂的宣传工作和机构,都统一在宣传委员会里面。为着宣传力量的加强和广泛,宣传通讯站,文化服务社分支社,文化驿站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是普遍地被建立起来,各地党报和新闻社也经过了切实的整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广党报且编印大量资料,“宣传书刊在大量地编发,宣传工作队在走遍着乡村,各种展览不断出现,党报在战地是加强了推行,各地的座谈会吸引着大量革命的优秀的份子”^⑥。为了使得广东民众明了抗战情况且推进战地工作,“特发动并津贴各县党报,遵照中央颁发《推广党报战地发行办法》增出纸数,战区及游击区历时分别酌为补助邮费,商定由《中山小战报》《大光报》《阵中

① 参见沙东迅:《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粤海抗战史谭:沙东迅广东抗战史学论文选集》,第160页。

② 周道瞻:《余汉谋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1996年6月3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29页。

③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2页。

④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4页。

⑤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5页。

⑥ 参见龙舆:《三年间党的动向在广东》,《满地红》(广州)第2卷第9期,1940年7月7日,第6页。

日报》，按日报报寄于各游击区党部，以资分发当地军民阅读”^①。

广东省党部在抗战期间为了动员民众配合作战，新成立了一些机构，以适应战时所需。早在前两次粤北战役时，广东省党部即“组织战地服务委员会，派出数十人前往前线，训练、动员民众，协助军队输粮运弹、向导、担架、疏散民众、救护伤病军民、谍报、翻译等工作，举办宣传图画巡回展览、战地宣传队组织及活动。其他如从事征募慰劳运动，派遣慰劳队前往粤北各战地县份及湘省长沙等地，推展社会服务工作等等，均获中央嘉许”^②。1940年5月李汉魂称，“全省已成立乡农会565个，去年各县办理慰劳征募工作，计征募戎衣鞋袜代金5万6千余元，棉背心代金9万元，邮票22万4千余分暨书报杂志甚多。并办理慰问出征军人家属，负伤将士，暨慰劳前线将士等工作，各县市同志均能努力去做，尤其是这一年来党政军各方面的协调，更为良好的现状”^③。

总之，李汉魂兼任粤省党部主任委员之后，在推动粤省党务工作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尽管有许多人事分歧和党务弊病，但毕竟为抗战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三 “党政联系”下的粤省党务纷争

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政关系在中央为以党统政，在省一级为党政联系，在县一级为党政融合。李汉魂以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体现国民党中央在地方上实行党政联系的目的，同时李汉魂也意图独揽广东地方党政权力，他早就认识到“政源于党，党以政行，政如无党，如无源之水，党如无政，如无轮之车，所以党政必须打成一片，而收相成相长，相互为用之效”^④。李汉魂主粤之初，即“晓得党政联系，最好是把省党主委和省政主席两职集中于一身，要这样站得稳，就要在党务方面搞好天线和地线”^⑤。然而正因为党基薄弱的李汉魂对粤省党权的重视，其与朱家骅系、CC系、余汉谋系等不但没有搞好关系，而且不断产生党务纠纷，受到各方指摘，最后被迫交出党权。

李汉魂的“所谓搞好天线，就要对中央党部攀得紧”^⑥，主要是攀附旧有的CC系和新形成的朱家骅系，由于与两派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为此李汉魂可谓煞费苦心。一方面，李汉魂通过其心腹郑丰组织中山大学同学会，并兼理事长来亲近朱家骅。因为“郑丰在中山大学毕业时，正是朱家骅当校长时候，虽然以前两人不大相识，但此时朱家骅正要利用旧日中山大学员生来供自己驱策，因此郑丰便被朱家骅看重”^⑦。李汉魂由此也可与朱家骅相联系。1939年5月，李汉魂还“以粤省人才参加党政训练班者寡，推荐民厅科长陆冠堂参加受训，惟因交通阻滞恐不克如期报到，仍望特准入班受训深造”^⑧。另一方面，李汉魂也忌惮CC系在国民党党务方面的旧有基础，“二陈在党的势力大而人才亦多”，不时暗送秋波。1942年底，李汉魂赴渝出席五届十中全会，曾记录重庆之行的收获，“结交张厉生——新任行政院秘书长，本系素识，但从此以后，始成为道义

① 参见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一年来广东党务设施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51期，1940年12月28日，第23页。

② 沙东迅：《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粤海抗战史谭：沙东迅广东抗战史学论文选集》，第159页。

③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2页。

④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5页。

⑤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7页。

⑥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7页。

⑦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8页。

⑧ 《粤省主席李汉魂致朱家骅函》1939年5月24日，特种档案6/44.8，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及政治上朋友矣”^①。1943年,李汉魂又派时任粤省党部委员兼组训处长陆冠莹,进入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以与当时班主任CC系主干分子张厉生拉近关系,进入CC系阵营。虽然陆冠莹受训回省后被任命为广东省社会处处长,但因还兼职省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秘书长及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等,其省党部组训处长职务因而交给李伟光接任。由此,李汉魂这一行动也并未使得CC系对其推心置腹。^②此时,李汉魂“虽对朱家骅、余汉谋与CC均做出曲意联络之态,但或因成见,或因利益冲突,使其最终仅凭一己之力固守阵地。即便如此,李汉魂尚可与朱家骅和余汉谋等形成的联合势力较量一番,则主要得益于其在政权力”^③。

与李汉魂试图“搞好天线”相反,其在省党部内部的种种做法,遭到其他派系不断指责,他们从党政关系方面来指摘“李汉魂主任委员因兼任省府主席,而其对党务之观念与意图,只为便于位置私人巩固其政治地位”,并强调李汉魂所采取的一切党务措施,均是本着“政治为主、党务为副”的错误原则,从而导致整个广东省党务工作“轻重不分,主从倒置”。同时,他们还指出,李汉魂“包办独揽为其一贯作风,因此对于省党部委员地位与职权之蔑视实为其必然之结果,举凡经费、人事等重要事件,莫不独断独行,先经批准判行,始提会交议,则事实上已绝无推诚协商之余地”。“此次省党部改科设处,一切组织规章人事调整等,事前绝不提会商议,各科科长、各股主管干事人选,仅凭其二三私暱秘密商定,强行支配,即事后亦不提会报告,独揽包办,神圣机关视同家室。”^④

李汉魂的“所谓搞好地线,就要对各县党部抓得住”,通过“政”的手段使得各县党部负责人听命于己,同时使得省党部内委员及督导员权力悬空。据当时广东省党部的工作人员回忆:“至于各县党部书记长的任免,要通过省执行委员会会议;而且为着操纵社会团体,以贯彻其党外各党的斗争,则各县党部书记长,不能不用其本地人充当。当时各县书记长,与李汉魂有历史渊源关系者绝少,而李汉魂又缺乏办党的干部,他不得不用拉来的办法。”^⑤在这种情形之下,李汉魂试图“以政治的力量推动党务,同时以党务的活动促进政治”^⑥。1942年、1943年,李汉魂“前后在曲江桂头的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内,举办过三期的党务干部训练班”,“以该团教育长即省党部组训处长陆冠莹兼班主任。班的政治训导和军事管教,均由团内人员担任;业务讲授,则请有党部的委员、处长、科长、秘书、室主任等担任。调训范围,为各县党部书记长、秘书、干事、助理干事,或区党部书记、委员。每期小县调训一人,大县调训二人,人名由省党部组训处指定,带薪受训三个月,旅费、膳费,均由训练团负担。通过训练,提升一些附己分子。其不服从调训,则予以撤换”^⑦。

李汉魂在“党政联系”之下积极推动县一级实行党政融合的策略,取得一定成效,“好像政府此次推行新县制,各级党部即作推行新县制的宣传。又如党部推行民众运动的工作,政府则以政治力量协助之。所以党政协调是很要紧的”。他认为:“关于组训民众的工作,今后政府方面

①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第386、392页。

②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8页。

③ 梁馨蕾:《抗战时期粤省政局的权力博弈与政治生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06页。

④ 《洗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7—38页。

⑥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5页。

⑦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8页。

多负一点责任，事权虽然分开，但最要紧的是分工合作。总之党政随时随地要取得协调相辅相成，才有良好结果。各县市党部书记长，富有行政学识和经验的，可以调任行政工作。各县市长或秘书科长，对党确有认识的，也可以兼办党务。”^①

李汉魂在地方党务上的这一做法，引起广东省党部内部一些委员不满，他们批评李汉魂在地方基层党务方面包办一切，其对于“各县党部书记长之更调，绝不征询负责督导专员之意见”^②。作为省党部委员的高信，因与恩县党部书记长黎德操有“史地”关系，在其“不服调训，被撤换后”，“高信在省党部委员会议时，曾提出严厉质问”^③。粤省各县党部书记长在李汉魂的委任之后，唯其马首是瞻，而对省党部委员则“亦以为与各委员了无关系，目无委员，甚至近在咫尺之负责督导专员亦从不晋谒，视若漠不相关，风气嚣张，纪纲荡然”^④。这样不仅无助于改善党政关系，而且刺激了省党部内部对于李汉魂的不满，经过三期党务干部训练班的办理，“对于私人派系的党务地盘改变不大，李汉魂也不能如愿以偿”^⑤。粤省党部内部人员尖锐指出：“李汉魂主任委员对党务之观念错误，立意不善。”他们还举例说明：“各县党部书记长之去留随县长之爱恶，而省府一纸公文省党部奉如敕令，对于党部之玩弄蹂躏任所欲为，因此使一般民众对党部之信仰锐减，对革命之热情下降，人民之情绪日趋涣散，领导之力量日趋低微。”^⑥

不管“天线”也好，“地线”也好，李汉魂“任用慕僚，最重历史地理关系，只有跟他工作日子久，或者是南路人，才敢引为心腹（李汉魂是吴川人，人们称他是大南路主义者）”^⑦。至于粤省“党政联系”的效果如何，1942年10月10日，李宗黄考核粤省党政期间表示“对粤省党政工作，甚为满意”，尤其“党政工作良好，政源于党，党以政行”^⑧。而其他粤省党部人员则称李汉魂，“工于心计，巧于规避，每遇中央大员莅省视察党政，闻人过境观光，无不粉饰外表，临急铺张，甚或遣其私暱轮流随伴，名为殷勤招待，实则监视隔绝，务使不能洞悉内幕，博访舆情，诤张为幻，讳疾忌医”。如此，广东省在李汉魂的治理之下，“年来粤省党务政治之落后为人所共知，揆其原因，即由于李汉魂主任委员之狭隘作风，藐视党务，迹其用心，实只有个人私图，罔知国家大势，故一切措施惟有粉饰铺张，蒙上欺下，所谓政绩只见宣传，毫无实际，玩弄之花样日新，民众之痛苦日甚”^⑨。

同时，在“党政联系”之下，李汉魂对于粤省临时参议会和青年团的各项事务亦有“染指”。有人指出，李汉魂在广东省第三届参议员遴选过程中有舞弊行为，原本从文化经济团体中推荐参议员，“照章应由党政联席会议，就省区内重要文化经济团体服务二年以上著有望望人员

① 李汉魂：《本省一年来党务之检讨与今后工作方针》，《广东党务》第9期，1940年5月1日，第5页。

② 《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参见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8页。

④ 《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9页。

⑥ 参见《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⑦ 陈榕亮：《李汉魂时期的广东党务》，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辑（军政类），第36页。

⑧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第378页。

⑨ 《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中遴选之”，但是作为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汉魂于1942年9月间，“乘李伟光与许成业出发潮梅督导党务，余建中、冼家锐出发湘桂慰劳空军，萧宜芬因母病请假返家，谢鹤年因回籍奔丧，高信委员出发南路视察之际，突然召开，遽行决定，名为紧急”^①。在数人缺席的情况下，显然李汉魂成了主宰者。同样，1943年3月李汉魂对于粤省青年团代表大会选举“极力统制，结果余长官所介二名皆落选，李伟光兄也被骗”^②。

由上可见，国民党中央在地方实行“党政联系”，本意在于推动战时环境下地方党政互助，共同发展，却种下粤省党务纷争之源。

四 李汉魂与“改组中”的粤省党务

国民党中央对于地方党务的弊端并非没有认识，只是在战时环境下只能屈从于军政需要，1942年11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曾提出整顿党务，改革“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为私有党，为公无党”与“党离党员，党员离党”的积弊，由此专门制定省党部主任委员应以专任为原则，从而使得以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汉魂如坐针毡，且在各方势力纷纷置喙之下，粤省党部改组消息不断，终难以阻止党务残缺不全的窘境。^③

李汉魂自知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位难以保留，却也不能坐以待毙，而是授意其亲信郑丰、袁晴晖、陆宗骐3人上书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有人欲破坏中大团结及党政联系，第一步拟以高廷梓先生出任粤省党部主任，第二步再取而代以私人，吾师高瞻远瞩，当不为所惑”，“年来李主席多用中大同学，党政联系成果甚佳，若中途更动，李主席受打击，环境必加困难，党政无法推行，如有人果有此企图，恳设法打消”，而且高廷梓亦“以本届参政员深感李主席盛意，甚不愿接任此职，以免引起误会”^④。不久，郑丰、袁晴晖、陆宗骐又联合李伟光、萧宜芬密函朱家骅，劝阻方觉慧接替李汉魂，“顷闻本省党务有由方觉慧先生继任说，留韶同学深诧异，查本省党务经伯豪主任委员苦心策划，大有进展，党政联系尤深密切，且以对我师之敬重，同学之信任，如能假以时日，成果当必无量”。他们还指出李汉魂去职后的严重后果，“深恐主任委员万一变动，则不特党务开展立遭波折，即同学事业亦将功亏一篑。万望吾师以公私关系对于粤主任委员力予维持，使野心者无所运用，忠实者知所奋勉”^⑤。李汉魂则以蒋介石曾经之许诺“前次郑彦棻同志回粤传示钧谕，省党部如改组则主委继人当以地位超然能协助省政者充任，并飭如有意见可报告参考，眷顾周详，至深感奋”，向其推荐“中委李宗黄同志在粤有年，对新县制富有研究，可否调派接充主委”^⑥。

面对粤省党部的改组传闻，各方势力面对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或保或荐，染指党部人事安

① 《冼家锐等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② 《张友德致朱家骅函》1943年3月2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开幕词》1942年11月1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69页。

④ 参见《郑丰、袁晴晖、陆宗骐致朱家骅函》1943年1月2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郑丰、袁晴晖、陆宗骐、李伟光、萧宜芬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1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 参见《抄李汉魂电》1943年11月，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排的私心均不落人后。1943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还未有明令之时，余汉谋就向吴铁城、朱家骅力保现任粤省党部委员余建中、李伯鸣、冼家锐、谢鹤年、萧宜芬、李伟光、许成业，“皆服务各级党部有年，夙称努力”，“今既得方公领导，尤望使之蝉联，则驾轻就熟，必能有所匡助，党务益臻开展”^①。朱家骅则复函，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曾有省党部主任委员以专任为原则之决议，惟粤省究应如何办理，尚未奉总裁明示”^②。吴铁城亦致函朱家骅，“因粤省党部改组在即，介绍粤省委员方少云，乞玉成之”^③。

此时，李汉魂在张发奎的支持下，意欲“党部酝酿改组，则向总裁直接坦白表示，党政不能分离。向公（即张发奎）亦去电一致陈请，倘终不能挽回，则我心已尽，因此一并请辞各职，亦有以对领袖也”^④。张发奎则向蒋介石言及，“以值此严重时期，宜使伯豪兄（即李汉魂）专其事权，不宜多所更张，即至万不得已，而党部必须改组，主委必须更换，则对人选方面亦拟请特赐垂询，使伯豪兄得就中委中之能匡助省政堪以继任者，举以上闻，俾供采纳，以期集中力量克服困难”。1943年4月，蒋介石随即指示，“广东省党部情况特殊”，“似可暂缓行动”^⑤。

在得悉蒋介石的态度之后，朱家骅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迅速上呈蒋介石提出《关于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调整案》。朱家骅拿出能够转变蒋介石态度的权威证据，认为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已经审慎研究“省党部主委应以专任为原则”，而中央组织部也对现由省主委兼任者的陕、冀、甘、青、宁、粤、桂、滇、湘、皖、晋等11单位，“依据全会决议，拟订计划进度，亦颇顾及地方若干困难，拟于本年十二月份以前先调整半数为专任，经汇列进度表。至于施行缓急则以各省党部实际情形为军政各方之协调，并须领导民众掌握舆情，协助政令之推行”。其中，“各省党部能达成此项任务者，固不甚多，而粤省党部之症结所在，对于军事政治之未能协调并进，影响殊大，值此严重时期，似不能不特加迅求解决”^⑥。同时，朱家骅还与吴铁城“决议更动该省主委，以方觉慧同志接充”，一方面“经转告方同志积极准备”，另一方面“此间同志与粤方面均对方同志继任消息反应甚佳”。朱家骅进一步强调，“前呈书记长人选即系与方同志商定拟呈者，若因李主委来电要求，而即予寝置，似未免有损中央威信，况迭据密报，李主委在党部一切专断，全不顾及各执行委员意见，省党部等于虚设，且于下级党部满布私人，不无可虑，各方舆情，亦甚不治，该省主委之调整，似不宜缓”^⑦。1943年5月9日，吴铁城和朱家骅一起致函蒋中正，“请以方觉慧赴粤主持工作”^⑧。

① 参见《余汉谋致吴铁城、朱家骅函》1943年3月16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② 《朱家骅复余汉谋函》1943年3月2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吴铁城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1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④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第425页。

⑤ 参见《蒋中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 参见《朱家骅上蒋中正呈》1943年4月29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⑦ 《朱家骅上蒋中正呈》1943年4月29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⑧ 《吴铁城、朱家骅致蒋中正函》1943年5月9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然而,广东省党部改组消息一出,“以致工作人员精神弛涣”^①。1943年12月,张嘉谋陈述李汉魂之态度,“现极力把握各县书记长及各区分部人物”,“经派郑丰、陆宗兴等分赴闽、赣、湘、桂、滇各省活动,意在联络西南各省党部与组织部对立”,“现搜集及制造材料,以作控告及宣传之用”,“联络CC”,“借派人出巡名义,极力把握各地方参议会及各社团”^②。同时,许成业指出李汉魂“失党权而尚主政,此后彼必挟政以制党,党政摩擦事端必多,甚且彼已拉用一般思想复杂者,以互相牵制或作路线以为声援,如最近之提派第三党主要人员陈卓斤为五区行政专员,即此意图。为粤省党政前途计,似应加速将彼政权立褫去,以免贻害无穷”^③。

李汉魂去职已成定局之后,朱家骅系成员则将粤省党务视为囊中之物,纷纷提议献策,“此次整饬粤省党务,全仗朱家骅准李汉魂辞职。百粤同志咸感振奋,惟粤省党务被李把持几年,内外层制,业经强植相当基础,今欲改进,除即将其私亲、委员、科长、县委书记等分别甄淘,补以忠干同志充任外,似应多容各方实力干员,以增力量,对战区再加联系军校实力分子,如吴迁宪等,亦可提任委员,使各方力量团结一致以求进展”^④。1943年12月李伟光、萧宜芬提出,尽管袁晴晖“过去对部政策颇有批评,钧座来粤后则甚感动”,但袁晴晖“以历史关系在粤究属不宜,如有机缘请予他调”^⑤。1944年1月,辛树帜致朱家骅函,“闻粤省党部改组,请推荐任国荣任省委”^⑥。朱家骅则复函“任君事,早拟使之加入,乃粤省执委中东江同志已占有半数,调动不易,此间粤籍同志时以此责难,而任君又籍潮州,故尚须待机而行也”^⑦。而李伯鸣则“请辞调回,照顾老母”^⑧,并指出“宣传处与文化会工作重要,萧宜芬为最适当之人,希采择”^⑨。许成业则向朱家骅建议,李汉魂“既失党权,必藉政制党”,“同时似应将其内外潜力淘清,如郑丰、陆冠莹以及无能之督导员、科长、书记长等,均可分别整除,以新阵容”,并乘机向朱家骅推荐军校学生主干吴迁宪为省党部委员,“一是以纳军方干才而增力量。二是吴籍属琼崖,该区十余县党务向由陈派之,曾三省督导员把握,将来对国省选代表,恐成问题,如吴为省委,则该区可控握”^⑩。许成业

① 《萧宜芬致朱家骅函》1943年5月26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② 《张嘉谋致朱家骅函》1943年12月2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许成业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④ 《许成业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李伟光、萧宜芬致朱家骅函》1943年12月2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 《辛树帜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⑦ 《朱家骅复辛树帜函》1944年1月2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⑧ 《李伯鸣致朱家骅函》1944年3月16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⑨ 《李伯鸣致陈绍贤、甘家馨函》1944年4月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⑩ 《许成业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10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亦毛遂自荐,强调“为求党基增固、党政配合,在粤同志非有参加政治力量以推动不为功效”后,提到自己“来粤工作几年,各方均深信识,现犹未兼他职,倘有机缘,敢乞俯赐提充为粤省政府委员,俾得从政推党、以党治政,使粤省党治更新”^①。

而CC系的余建中则表现得相对稳健,表示“以促新主委早日来韶亲事,一面宣布维持现状,暂不调整,俟过相当时期,可以慎选人员,去留之间,均可取得主动时,再行计划,既可免顾此失彼,复可留余地,似较为宜”^②。直到1944年2月,省党部书记长袁晴晖仍向朱家骅报告,“粤主委议决易人已久,迄未见南来接任,今后工作方针未见明示,各委员至感彷徨,各同志工作情绪亦感低落,拟请促方先生早日来粤,可遵循。至新主委就任后,关于书记长一职,如有适当人选,拟请准辞去兼书记长职务,委以委员之职,继续效力。总之,生献身于党,惟吾师之命是听,如何驱策,绝对服从也”^③。此时,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忘安抚一下即将卸任的李汉魂,他指出粤省党务“数年来赖兄主持,心力劳瘁,久深感念”,此次国民党中央对于粤省党部的改组,“事实上不过为兄分劳,此不得已之苦衷,当为明达之所深悉”,且“方党慧不日首途赴任,兄爱党爱乡,夙所钦佩,尚祈随加匡协”^④。随着方党慧的到职,粤省党务直到1944年中期才开始重新整顿。

结 语

总之,李汉魂作为已经归心国民党中央的地方军人,在战时敌我斗争的环境中,虽身负粤省党政责任,但其诉诸于党权来保存和增强自身势力,无疑会与朱家骅系、CC系和余汉谋系等其他各派摩擦不断。简而言之,国民党在粤省地方党务不彰的重要因素在于,各方势力更多专注于自身派系之权益,觊觎党务人事之安排,却疏于党德与民意的塑造。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李汉魂的“三民主义写读运动”尤为蒋介石关注,更博得全场热烈掌声,李汉魂却深有感悟,“总裁伟大的精神,固能感动同志,然仍不免面从心违,各图私便”。李汉魂在与李宗黄深夜促膝交谈后,亦“完全站在党人立场,发挥以党治国的议论,窃以为美中不足的是忽略了尚书‘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更大的原则,此国共之所以均未能以党治国、以党驭政、以党统军也”,从而触及国民党在粤省等地方党务组织涣散的真正痛点。^⑤由此,李汉魂在抗战时期即使是以粤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但因其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务力量素无渊源,在朱家骅系、CC系和军方余汉谋系等势力的掣肘之下,造成广东省党务机构薄弱,内部党务纠纷不断,影响了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党务工作成效亦不彰显,难以适应战时的内外斗争需要,显然国民党无法担当起领导华南抗战的重任。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许成业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② 《余建中致陈造新转朱家骅》1944年2月,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③ 《袁晴晖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9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④ 《朱家骅致李汉魂函》1944年2月1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6-03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参见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第381、386页。